

拨乱反正中的邓广铭

郝斌

邓先生的性格本来豪爽、痛快，那几年，他简直处于亢奋状态。那个时候，“邓小平”三个字，已经成为符号，只包含一层意思：拨乱反正。电话铃声一响，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：“我姓邓，邓小平的邓！”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“贵姓”，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。

1977 年，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连续招生三年，1977 年、1978 年、1979 年，把被甩到社会各个角落、却一心只想上学的一部分青年吸收进了高校。中国的高等教育，拨乱反正，回到了常规。说是常规，恢复起来并不容易。就北大历史系来说，当时的拨乱反正，多亏有个邓广铭。这个时段，有邓先生站出来担任系主任一职，应机立断，雷厉风行，有识见、有担当。他做了很多事情，也引出不少的议论。对于历史系的这三年，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做一番从容的回顾与评价。我觉得，当时如果没有一位邓广铭，历史系的后来当与今天有若干的不同——至少，中国中古史中心就提不上日程。在邓先生之后，继之而来的是周一良、田余庆、马克垚、何芳川四位主任。他们在任内，各有各的环境，也各有各的担当。环境、时空不同，完成的任务也各异。1978—1981 年，历经板荡十载，动乱方平，邓先生应运而生，他拿得起、放得开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撸起袖子”干了一把。能让历史系由乱而治，已属不易，而乱中竟然还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，应当说，在历史系的历史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。

学校本来是一个打钟上课、打钟下课的地方。“文革”以前，像一教、二教这些大教室里面装有电铃，响铃上课、响铃下课；而分散的小教室，多半由小语种教学或高年级使用，则要听未名湖畔的钟声有行有止。钟声、铃声岑寂十年，到了 1979—1981 年，倒退回去，电铃不灵光，双轨变单轨，上课、下课，全靠未名湖畔的钟声了。打钟人老赵，多少步走到钟前，计算精准，钟声不差半分，电铃呢，常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冒响几声，反倒成为一件恼人的事。打铃问题，在周培源校长任内没排上日程，到了张龙翔校长的后期，才算完全解决，那就到了 1982、1983 年了。



1977 年，70 岁的邓广铭在颐和园

至于教室的窗子没有玻璃，西北风直往屋里灌；数九寒天，暖气片只散出丝丝暖意；学生恼火食堂的大字报隔三岔五就贴出几张……如此等等，校长发愁的是这类事。这就是当时的北大。

学校的大环境如此，历史系如何呢？名教授凋零甚多，翦伯赞、向达、邵循正、齐思和、杨人梗、汪钱等六位名家几年之内先后故去，教师阵容大不如前。其实，这已是有目共睹的损失，而历史系的沦落，何止于此？！我可举出两事为例。第一例，性质虽属极端而个别，或可借此一斑得到些许的了解。那个时候，系里有什么活动通告出来，都是写在一块小黑板上，由主事者自己去写，不过是时间、地点、事由等等，多不过百字，字体好坏不论，要命的是错白字。三个通知，就得出现一处，甚至一个通知里出现过两处。写这个通告的，是留校任教的老师，还在系里主持些事情。我要说的是，这绝不代表青年教师的一般水平，这是一个很个别的事例，但留校的青年教師，水平跌到这个份上，多少

也说明些问题。另一例是称谓。说到这个称谓，可就不是偶见、极端的个别事情了。因集体生活频繁，彼此如何相称，这是每人、每天都要遇到的事。且以邓先生来说，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直呼他为“老邓”。在历史系师生同住的 36 楼里，一个好长的楼道，一人在东，一人在西，东头高喊“老邓”，呼之者有六十岁的，也有三十岁的，呼声坦荡而自然，被呼的邓先生倒也不很在意，应答一如平常。读者朋友有所不知，这是“文革”破“四旧”的结果，也是废除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结果。总而言之，没大没小、错白字连篇，虽不可用来概括历史系的全部，而斯文受辱、乐坏礼崩，确是当时的客观存在，并非夸张。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学校找到了邓先生，请他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

话说邓先生当年 72 岁将满，孔夫子周游列国的年纪早已过去，系主任一职，他婉拒亦无可，不想竟出手接了过来，这倒成为一个非常之举。四十年过去了，如今我们不免

一问，行事素来有见的邓先生，何以会做出这种非常的举动呢？

准确地说，邓先生接手系主任一职是很痛快、很情愿的，说不上被动，更没有什么无奈。在邓先生来说，他这样做，完全出自一份情怀。可惜的是，他的这份用心和情怀，当时没有为许多人所窥察和理解。这样，就使后来发生的事，因不知情、不理解而生出误会。他当时的心理是，环顾系内，同怀、同辈远去的远去，留下某家一人，如今的系主任一职责任又是非同往常，我不担起来还让给谁！历史系已经濒临如此境地，再有推脱就说过不去了。那个时候，邓小平派到北大的新党委威望高望重，承载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期望，心存这种感念的邓先生，听到新党委一声有请，他没有半晌沉吟，即刻出山了。他扛起系主任这个担子，是仁是勇，其实跟请纓出征差不多了。

上面这段分析，是我从当年的观察和后来的参悟中得来的。时隔多年，才迟迟生出这一点醒悟。我想，后来发生的事实，或许可以印证我的看法。

邓先生的性格本来豪爽、痛快，那几年，他简直处于亢奋状态。每天上午，他都到二院来坐班。那个时候，房子紧张，他没有独用的办公室，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，人进人出。年轻的朋友，你知道这进门的，当年是个如何进法？叩门而进那是知礼的，推门直进那是有怨的，一脚踢门闯进来，那一定是积恨多年、又无处伸发的。隔壁是总支办公室，那里更热闹。历史系总支两位副书记张万仓、郑必俊埋头清理历史系近三十年的冤假错案，前后足有半年之久。有人进去申诉啼哭，有人感谢平反甚至下跪，弄得他们手足无措。邓先生接待来者，无论来自校内校外、事大事小，本来都是些跟他无关的杂务，处理起来总是那么耐心。他办不了的，至少会告诉来人该去找谁。那个时候，“邓小平”三

个字，已经成为符号，只包含一层意思：拨乱反正。电话铃声一响，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：“我姓邓，邓小平的邓！”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“贵姓”，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。我在旁边看了先是心里好笑，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，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。邓先生上任在 1978 年底，这个时候，77 级入校已大半年，78 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，一朝遂愿入校，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。上课，这是劈头第一大事。

没有任何准备。上了轿还没扎耳朵眼，一切都是遭遇。邓先生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，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，更不要去上基础课，要去进修。他跟我说：“你说谁能上课？要不是这个岁数，我该先上！”他还跟我说：“能上的，倒是有两个，可他们能来吗！”邓先生说的这“两个”，一指周一良，二指田余庆。当时这两个人正在“梁效”学习班接受审查。这样，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。一时之间，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。有宁可讲《中国通史》、蔡美彪讲《辽金元史》、漆侠讲《宋代经

(下转 3 版) ➔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李纯一 lic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：
邓广铭先生，1995 年
(沈建中摄)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